

在激进与理性之间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现状评述

杨 乐

提 要 | 从巴黎公社到五月风暴,法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一个多世纪。在全球化的今天,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交叉性学科研究和新范畴的引入,使得内在矛盾重生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不断开拓新的理论前沿。在左翼文化和新自由主义话语权的现代政治文化生态中,法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却陷入了现实合理性的困局中。当资本主义技术理性最终宰制了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不得不以“激进理论”的方式再一次投入到“揭露”和“批判”的理论斗争中。

关键词 | 法国 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 B565.7

作者信息 | 女,198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102488。

自从19世纪末的莫里斯·拉沙特与拉法格开始,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呈现出颇为迅猛却又稍显另类的发展态势。20世纪中叶至今,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产生了众多影响深远的流派,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广泛的交叉研究,但是始终无法突破语言对于实践的历史性局限。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法国当代史中所扮演的矛盾角色,既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在理论上的反映,又是科学与价值的矛盾关系在理论解读中的体现。

一、“低估”还是“高估” ——理论的内在论争

18世纪以来,法国人文社会科学有着一种独立于英美经验主义和德国理性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内在气质。启蒙时期的思想流派,尤其是卢梭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所遭遇

的“误解”和“拒斥”已不再让法国学者感到惊讶。这种追求激进的理论态度反而成了延续至今的理论传统。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始终是一个不过时的“开放话题”。个体化的理论研究和开放的辩论,使得法国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在法国的理论研究中始终不是必然的“一”,而是不可或缺的“多”。如德里达所认为的,这个时代“不止只有一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不止一个的马克思的精神”。^①

虽然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理论界中甚为耀眼,但是法国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科耶夫与列斐伏尔以来,就从未在提

^①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de Marx. L'état de la dette, le travail du deuil et 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 Paris, Editions Galilée, 1993, p. 36.

供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的舞台缺场。正如雷蒙·阿隆所总结的那样，“从二战以来，至少每隔十年，塞纳河左岸总有一位哲学家提出一种对马克思的解释，或把他之前从未有人想到的一种观念赋予马克思”。^① 但是问题在于，被赋予观念的马克思主义，即在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够继续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进行言说？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扩展，是否在理论准备上超越原著所提供的理论质料？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政治化的努力，是否在理论生成后被矫枉过正而导致对“理论”本身的低估？这些问题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激荡的政治浪潮中，特殊的历史情境塑造了各种流派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机制，但是也造成了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始终未得到解决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核、方法论、时代价值和实践的两种极端的理论现象：或是“低估”马克思主义本有的理论内容，因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于草率的扩展和解释；或是“高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质性，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发掘显得畏手畏尾。

首先，“低估”凸显为法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译介工作的长期忽视和缓慢进展。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欧洲经济复苏的缓慢，学界和民众不得不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的论述。另外，随着保罗·马迪克的《马克思与凯恩斯》、雅克·比岱和厄斯塔什撰写的《当代马克思词典》等学术著作的先后出版，法国许多具有颇高声誉的国家级考试将马克思的作品纳入考察范围。^② 马克思主义看似在21世纪的法国呈现出“回归”的强势姿态，但是这并没有阻挡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学术界被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马克思的著作至今都没有完整的法文全集。如果仅看几十年来法国理论界浩繁的著述，似乎难以相信法国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们反复论辩和解释的众多著作至今未被系统译介。曾经隶属于法国共产党的社会出版社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多年中，也不过仅译介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与《资本论》第六章，这对于填补“大典”空白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在译介工作如此滞后和惨淡的前提之下，关于如何扩展、改造、批判和解读马克思的研讨会却几乎每年都在巴黎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于理论自身内容的“低估”和轻视，最终导致当代法国所发展出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之间矛盾重重，许多理论甚至在退回到“黑格尔主义”和“笛卡儿主义”的情况下仍然继续以“马克思主义”自我命名。毋庸置疑，这对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阻碍。

其次，“高估”凸显为对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之间的断裂的坚定信念。当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论争逐渐消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从文字形而上学中释放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维度上的独特批判性，但是这种批判性却在过高的起点被艰难地继承。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低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低估马克思”，所有当下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和拒斥不过是因为马克思本身现时代之间不可跨越的断裂。现代理论工作者要承认并继承这种时空断裂造成的错误，并为马克思“守灵”。^③ 德里达的这一论断至今仍体现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环境中，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成了退回到言语的幽灵，而新的理论却始终外在于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当法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资

^① Raymond Aron, *Marxismes imaginaires. 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70, p. 329.

^② [法]让·努马·迪康热：《2000年以来法国马克思主义及左翼研究概述》，赵超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③ Jacques Derrida, 1993, pp. 276 - 278.

本论》在2014年掀起了意想不到的评论热潮时,许多西方媒体却着眼于拿皮克迪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进行较劲。^① 尽管前者不过是对马克思关于平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论述进行补充和延伸,但因为被“抬高”为幽灵的马克思始终无法在文字中得到确认,所以关于该理论的讨论或是彻底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或是处于与马克思主义平行甚至对立的境地。

马克思主义对于法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应该如何定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被法国理论界认知为推动历史进步的理论力量,并不是一个纯然的理论问题。今天的法国,当经济全球化夹杂着好莱坞快餐文化的浪潮席卷而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可避免地将被市场的喧嚣所掩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此被遗忘。正如巴迪欧所强调的:“真理要在知识上打洞”,^②这在表面看来是对百科全书式的平面的知识体系的批判,实质上则是为了说明理论的真理性必然要超越现实合理性,并且洞穿资本逻辑的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之网。马克思主义不论是作为被“高估”的梦想,还是被“低估”为青春的反叛与批判的策略,都将因为其时代的穿透力而不断影响法国哲学、文学和政治的生态。

二、“共产主义”还是“左翼”

——实践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正是由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践滋养了如“自由”“平等”和“革命”等理论范畴,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和运动才得以长期自洽于法国的政治环境中。正如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平等主义倾向完全来自卢梭主义的影响,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则是一部“充满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著作”。^③ 从巴

黎公社至今,马克思主义实践在近当代法国所走过的历程并不是内在一致的。从共产主义到左翼,从政治变革到日常批判,小农经济及其传统大行其道的国内状况,以及强势外部干涉力量的介入,改变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方向。当法国共产党在2013年放弃了镰刀锤子的符号,这几乎标志着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已完全从对理论的忠诚中抽身出来。14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并没有带来法国社会的彻底变革,反而成了对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和消退的历史性复刻。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就必须在实践中忠实地展现理论的现实批判力,将思想从单纯的言谈中解放出来,即解决“从语言降到生活的问题”。^④ 不论是巴黎公社还是五月风暴,虽然其激进的形式在短时间内席卷了世界舆论并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始终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入实践当中。当代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已经从革命的战线撤退出来,这与其流派众多却越来越激进的理论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共产主义已在20世纪60年代的“去政治化”浪潮中被一同摒弃,左翼成了实践方向的代名词,如果偶然某个流派呈现出批判锋芒,则会被冠以“左翼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实践在当代法国政治生态和社会文化中是晦暗不明的,学者们似乎羞于识别实践本身的属性,民众则沉迷于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狂欢式(carnival)的政治论争之中。这种既不诚实于历史又不诚实于理论的困境并不是法国独特的历史逻辑,

^① 陈平:《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红旗文稿》2014年第12期。

^② [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③ Galvano Della Volpe, *Rousseau and Marx: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79, p. 149.

^④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

更不是某种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质所造成的,而是由内外历史性客观要素所决定的。

首先,辩证法的历险从来都没有终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清晰地被各种“教条”刻画出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开放的讨论空间并没有促使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结出持久的变革果实。相反,各个流派对于不同理论阐释的教条即使是在左翼运动高潮的五月风暴中,也成为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杂糅。教条主义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以最为自由和个性化的方式得到了实现。20世纪70年代被阿兰·巴迪欧称为最后的革命性狂热的日子,法国共产党以及社会党左翼仍然机械主义地坚持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阐释,或是退避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①寻求与资本合理性更加详洽的实践方式。除了这些政治组织之外,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五月风暴带来的自我定位危机之后,虽然摆脱了“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②但也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应有的现实批判性。

其次,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旦在主观层面被马克思主义者所否认,资本主义的普遍宰制就必然不可逆地重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布拉格之春”前后,新自由主义在法国的优势地位就逐渐被确立了,其政治努力一开始就在于劝侑人们相信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政治气质,并将社会规划描述为无意识形态的自由社会。但是,关于这个问题,阿尔都塞早已在其人道主义批判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意识形态斗争在现代社会完全是结构性的,而“只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才能想象出无意识形态的社会”^③。然而,法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们已然接受了通过代议制民主消除意识形态的论调,在实践层面丢失了直面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抽象思想对社会文化的统治。^④

另外,左右政治联盟和流派长期角逐的

法国民主政治体制,为全球诸多对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抱有极大热忱和幻想的“新左翼”人士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支撑。但是,必须看到的是,由于代议制民主及其选举竞争长期以来对选民心理的娴熟掌控,浸淫于纯粹政治道路的法国共产党或左翼政党在事实上已经通过其政治实践叙述了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乌托邦”。热拉尔·格兰贝格(Gérard Grunberg)分析了法国左翼政党内部关系形成的结构性原因,认为竞选政治的策略始终是核心议题,而马克思主义只是被当成了催生政党联盟的外在动因。法国社会党虽然在历史上深受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从未考虑过与法国共产党、环境主义者之间的联盟。^⑤该党于2011年的党内改革催生了这些在理论上颇为矛盾的政党的联盟,并最终帮助社会党在之后的选举中获得大胜。另外,在理论、组织和原则上已经相洽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法国共产党,尽管如拉瓦布尔(Marie-Claire Lavabre)与普拉托内(François Platone)所论述的,在70年代就不断遭到严重削弱,^⑥但是因为选举的功能而始终发挥着其鲜明的符号价值——即它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政党、一个有能力表达左翼激进政治意图的政党。然而,这些只停留在符号和竞选口号的政党,不论其实践动机还

^① Alain Bergounioux et Gérard Grunberg, *L'ambition et le remords. Les socialistes français et le pouvoir*, Paris, Fayard, 2005, p. 148.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页。

^③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28页。

^④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⑤ Gérard Grunberg, *Le Socialisme français en crise*, *Modern & Contemporary France*, Vol. 22, No. 4, 2014, p. 462.

^⑥ Marie-Claire Lavabre et François Platone, *Que reste-t-il du PCF?* Paris, CEVIPOF/Autrement, 2003, p. 58.

是最终结果,都难以承载起马克思主义对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所提出的基本立场和要求,更无法在资本批判的前提下创造社会变革的条件。

三、“激进”还是“理性” ——批判的曲折延续

尽管政治实践实际上已经遭遇了组织上的失败与属性的蜕变,但是今天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样态却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进色彩和勇敢姿态。法国哲学家对毛泽东思想的长期坚持和解读,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典型例证。在当代法国,历史唯物主义在被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中进一步确认为历史科学。^①但同样是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被选择性地言说为激进思想?那么,为什么要选择激进?这将如何影响未来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走向?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到“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②20世纪70年代中叶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折点,这个时代被巴迪欧认为是资本主义对“思想的非理性激情的经济化胜利”的开始。^③这意味着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成了代言个体日常生活规划的外在力量,而欲图超越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仅在学理层面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攻讦和压制,更在社会文化的解构层面遭遇了重大的阻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敌人“并不能准确表述为一种力量……是不偏不倚的堕落,或者说是一种原生”。这种整体的原生性的堕落促使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主题的更改。稳扎稳打的学理分析和批判已经无法应对“敌人”的压倒性优势,并且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而被激化的社会危机更不会为传统的理论批判留下太多的时空余地。因此,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凭借激进和激情转身投入到“揭露”、“解构”和“还原”的工作中,根本的实践问题被巴迪欧表述为“新世界只能在废墟上实现”。^④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或相关研究之所以

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不断开辟出新的理论阵地,以至于被人们认为是随着德国哲学之后的又一哲学高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法国哲学历来有着对一切现有理论(尤其是主流理论)怀疑和批判的传统。从笛卡儿到伏尔泰,从卢梭到20世纪交替兴起的思潮,在不断的拷问和质疑中理论前沿被不断拓展。另一方面,法国学者对批判力度不彻底性的无止境的不满,促使法国的理论研究最终跨过了一切被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理性沾染的方法论,青年马克思的激情和主观力量被视为推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成为现实的唯一途径。

因此,当技术统治和新自由主义从两个方向重新将主体性推入“空洞的、分裂的、非实体的、非反思性”^⑤的悖论式状态,笛卡儿式的反思,或者任何在形而上学残余中次生的理性规划都无法再使主体称为自由的,哪怕是单纯主观和意识层面的自由。被阿尔都塞之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伟大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被巴迪欧指认为“不存在任何规划(project)”,因此能够对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和意识形态宰制进行“报复”乃至“批判”。尽管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研究和实践两个层面都遭遇着历史性的困境,但是法国的理论工作者始终“灵魂深处闹着革命”(changer l'homme dans ce qu'il a de plus profond)^⑥,以巨大的激情和理论责任感考察着以中国崛起为信号的新时代的到来。

① Louis Althusser, *Montesquieu-Rousseau-Marx: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Verso, 1982, p. 166.

②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③ [法]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④ 同上,第51~52页。

⑤ Alain Badiou, *L'être et l'événement*,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8, p. 9.

⑥ [法]阿兰·巴迪欧,2011年,第12页。

五月风暴之后的法国理论界,在经历了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浪潮之后,最终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在这看似全新的话语体系和术语网络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了不再“出场”的存在。这种表面上拒斥马克思主义概念和价值立场的社会批判——如卡罗尔·爱德华(Carole Edwards) 所论述的新左翼历史学家的尝试——在“法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失败”之后不再坚持传统理论话语中的反西方潮流,而是尝试着通过后现代主义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①但是,这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在继续着马克思主义所未竟的批判事业,并且以各种方式来转述或回答巴黎公社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向理论界提出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之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也遭遇到了与法国马克思主义较为类似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历史和现实中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延续性。这个问题对于身处法国的鲍德里亚而言,已经成了几乎不可扭转的定论,这是在法国共产主义运动遭遇自由市场的打击之后产生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结论。鲍德里亚认为,今天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更为响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几乎听不见,但是告诉了我们与革命相

分离的光年数——“革命,即拉开历史序幕的事件,这种事件说到底从未发生过,而且我们最终也不可能接近它,由此导致了任何历史真相的不可能性,还有任何起源科学的不可能性”^②。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最终掩盖了活的历史,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阻隔了个体生存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关于真实和真理的追问在法国几乎再一次退回到了启蒙时期的古典资本主义论调,即工具理性和经验主义,这不仅悬搁了对意义的追问,同时也放弃了对现实的真实批判。相反,法国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琳达·戈东(Linda Gordon)尖锐地指出,“那些被报道出来却没经过正确解读的‘事实’”尽管是经验主义者不加反思的“历史实在”,但“将是毁灭性的”^③。这恰恰呼应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国家的定义,同时也承袭了阿尔都塞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深刻剖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今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和理论流派充斥着中国的大学、网络和公共舆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所推动的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重新发明,是如何的意义重大!

(责任编辑:张莉)

^① Carole Edwards, Réalité ou fiction? L'histoire à l'épreuve du postmodernisme, *Revue européenne d'histoire*, Vol. 18, No. 4, 2011, p. 488.

^② [法]让·波德里亚(鲍德里亚):《冷记忆:1995~2000》,张新木、陈凌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③ Linda Gordon, Entrevue avec Carol Lasser, Dans *Visions of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pp. 76-89.